

唐代长安传奇小说创作嬗变之空间解读与群体分析

王伟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 科举取士是唐代长安最重要的文化事件, 它不仅左右时风流尚, 还助推“士妓”小说母题的诞生, 其所派生的新型士人群体不仅构成了唐代小说创作、传播的主力, 也构成了读者群体的中坚。长安文化群体, 或以血缘、或以姻缘、或以业缘、或以学缘等关系构成小说创作群体, 在内容或风格上保持相近性。长安城市空间布局对于题材搜集、情节设置、叙事背景的搭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小说中的长安文化意象还因时代不同而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

关键词: 长安文化; 唐代小说; 文化投置; 创作嬗变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6-0173-06

长安是唐代传奇小说创作的基地, 也是展衍世俗歌哭、生活百态, 建构小说抒情体系的文学空间。鲁迅《唐宋传奇集》、汪辟疆《唐人小说》所辑录的唐人传奇小说中, 关涉长安或三辅者占总数的73%以上, 而《李娃传》《霍小玉传》《柳毅传》《莺莺传》等杰作都是取境于长安。可见, 长安与唐代传奇小说在文化媒介上具有先天性。然学界多据文本对传奇作本位分析, 或依世态对其进行文化关联性研究, 而较少结合长安城市空间迁动、阶层文化升降、世风时态变化对其进行交互式研究。职是之故, 本文从长安文化事件、文化环境、文化群体的动态变化入手, 研究唐代传奇与长安文化的关系, 希冀结合区域文化环境对唐代小说的创制、传播空间进行深入探析。

一、长安文化事件与传奇小说

唐代长安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主要是通过对皇权的塑造来实现的。皇权塑造多以礼仪规范为手段, 并赖官吏选任体系来实施。在革除先唐选士积弊的基础上, 李唐立国就以科举为手段逐步建构了知识性官僚体系。科举作为有唐一代最为重要的文化事件, 对唐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影响甚巨。长安为隋唐五代至为重要的文化、政治中心, 无疑也是科举这一文化事件的主要举办地。无数士人于此或春风得意, 或歌哭人

生。从生员来历看, 无论是州县解送, 还是官学生徒, 众皆以“京兆为利市, 同华为荣美”, 故“里闾无豪族, 井邑无衣冠, 人不土著, 萃处京畿”^{[1](417)}。《唐摭言》载牛僧孺进京干谒, 韩愈、皇甫湜首先关心的是牛氏的居住地。当得知牛氏尚居国门之外时:

二公沈然良久, 乃曰:“可于客户税一庙院。”僧孺如所教。……奇章之名, 由是赫然矣。^{[2](1342)}

牛僧孺贞元二十一年(805)进士及第, 但该故事所折射的社会风尚却颇具可信度。长安借科举而对士子产生巨大的向心力, 并左右一时文化风尚, 从而成为影响唐代传奇小说创作的重要因素。

伴随经济与商业的繁荣, 长安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都市文化空间得以重新布局, 庶民文化渐次繁荣。长安的巨大吸引力令科举士人炫目, 选艳征歌、寄情声色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主动选择。“长安有平康坊, 妓女所居之地, 京都侠少萃集于此, 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之风流薮泽。”^{[3](15)} 科举士人寄兴青楼, 流连北里, 面对群妓的风流举止、裂帛之歌喉、柔曼之舞姿、入时之妆束, 遂多生眷恋。白居易《和元九与吕二同宿话旧感赠》:“见君新赠吕君诗, 忆得同年行乐时。……闻道秋娘犹且在, 至今时复问微之。”^{[4](285)} 即是对此类生活的追忆。而歌妓声名之黜陟、身价之升降则全视士人之品题, “誉之则车马继来, 毁之则杯盘交错”。在不受伦理束缚的情况下, 士妓间不唯欢场作秀, 亦有深挚情爱。如誓不

收稿日期: 2016-03-21; 修回日期: 2016-10-20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转型与唐代关中文学群体互涵关系研究”(16XZW009); 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文化转型与唐代关中文学群体研究”(15YJA751028)

作者简介: 王伟(1978-), 男, 陕西汉中, 博士(后),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唐宋文化与文学

独生而以身殉情的欧阳詹与太原妓,不邀财货但慕风流;的霍小玉与李十郎,唱酬往还而心交神会的薛涛与白居易,他们的风标品第都独高一时。此类遇合无疑为“士妓”小说母题的诞生提供了绝好的温床。

以士子冶游经历为主题者首推张鷟《游仙窟》。小说自叙奉使河源途中的艳遇,文中十娘、五嫂尽为名妓风范,遇仙经历亦为青楼宿妓的真实写照。其以欢场燕笑和身体放浪等感官刺激为重点,表明该题材尚处初期阶段。中唐士人趋重实务,吟赏烟霞但不忘接通地气。《霍小玉传》《李娃传》俱以长安平康里为情节展衍地,情致委婉却又旁涉科举、家族、门第等社会问题,皆具“以一家写尽天下”的典型性。现实中,士妓因才色而相互吸引,但一旦落实于婚嫁,则饱受社会舆论和市俗成见的拘制,遂多以悲剧收场。在《霍小玉传》中李益一出场就陷入家族利益的矛盾之中,而《李娃传》中的李娃最终虽获得比霍小玉幸福的结局,但仍难掩双方门第不对称的尴尬。有唐一代,不乏歌妓从良者,但为人姬妾者众,为士人嫡妻者寡,这是唐代士妓文学的普遍结局。^{[5](259)}《霍小玉传》《李娃传》在情境营造、细节描写和人物刻划上都呈现出精巧圆熟的特点,标志着“进士与歌妓”母题创作的成熟。稍后,《欧阳詹》《戎昱》《杜牧》等都从不同程度上丰富了这一创作趋势。

科举取士这一唐代最为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文化层面的影响而言,它不仅使长安社会文化和士林风气为之一变,而且造就了不同往古的士人知识群体,催生了唐传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对传奇小说的题材选择、精神特质和美学风貌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长安文化群体与传奇小说创作

家族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家族内部家教门风常对族员思想、精神与言行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魏晋以后,家族或以文胜,或以武显,或以艺称,子承父业,前后相继,累世为学。家族潜在的文学传统自然对族员的文学趣味、创作产生了影响。以唐代居处长安的小说家而言,张鷟、张荐、张又新、张读乃至其外祖牛僧孺均有小说传世;段成式及其亲家温庭筠、后辈段安节、段公路等亦以小说名于一时。这不仅是长安文化影响之结果,也是家族门风传承之结果。

《旧唐书》云,张荐“深州陆泽人。祖鷟字文成……子又新、希复,皆登进士第……希复子读,登进士第,有俊才”^{[6](4023-4026)}。张鷟为张荐之祖,张荐为张又新

之父,则张荐又为张读之祖,牛僧孺乃张又新姻亲,为张读之外祖。张鷟生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于上元二年(675)进士及第,因“倪荡无检”不为主政者悦,遂以旁逸之才在小说创作上为世所瞩目。《游仙窟》因笔调直露,一时讶然。《朝野僉载》则记载南北朝至玄宗时的奇闻轶事,于史料上颇有可观之处。张鷟之孙张荐在天宝年间居史职,参典礼仪,久居长安。受门风影响,张荐的传奇创作亦以怪为美,所著《灵怪集》虽佚,但据李剑国由《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所辑残篇来看,其作秉承六朝志怪小说遗韵,专述鬼神之事。张荐之子又新、希复皆进士及第。长庆中,李逢吉欲倾翰林学士李绅,“求朝臣中凶险敢言者”,又新预其事。可见,家族特有之好言险怪传统并未消退。希复之子张读,大中六年中进士,以《宣室志》享名于唐末传奇界。《宣室志》得名于汉文帝夜半问贾谊神鬼之事的典故,以明该书述“神鬼之事”的主旨。该书表现出从长篇传奇故事向六朝单篇鬼怪小说的回归。此外,牛僧孺乃张又新姻亲,为张读之外祖。牛僧孺贞元二十一年(805)进士及第,其小说创作以《玄怪录》最为人们所知。该书多托言先唐往事,并辅以隋唐时事,内容以神仙道术、定命再生、鬼怪妖物等为主。尽管张氏籍属深州(今河北深县)、牛僧孺望出安定(今甘肃灵台),但他们的传奇小说几乎全部完成于长安任职期间。^{[7](65)}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由血缘、姻缘关系交结而成的文人群体,表现出以下共同特点:首先,作者多为进士出身。其次,都有长期居留长安为官的仕宦经历。这不仅体现出家族文化传统对他们的小说创作的潜在影响,也表现出长安这一特殊的地理文化空间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最后,从张鷟《朝野僉载》《游仙窟》、张荐《灵怪集》、张读《宣室志》到牛僧孺《玄怪录》,其小说多述神怪灵异事,对志怪题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可以说张氏家族小说家的长安创作具备一定的群体特征。这个长安传奇小说世家的创作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成为唐代长安文学群体在唐传奇领域中的代表。

以段成式为代表的段氏家族亦属居处长安的小说家群体。段氏家族于隋唐之际以军功起家,其四世祖段志玄属太宗元谋功臣,数代之内皆以战功立名,并于唐初自临淄徙家长安。段成式父段文昌,为家族辟文质发展新路。段成式自幼居长安,及长,于修行里营置私第。^{[8](305)}段成式“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9](3764)},后赖《酉阳杂俎》于文坛留名,该书序云:“固役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8](1)}但就内容而言,其远逸志怪题材之外,包含自然天象、文籍典故、草木虫鱼、方技医药、佛家故事等,颇显其见识之广

博。段成式之子段安节为温庭筠之婿^{[2](2782)}，著《乐府杂录》，书成于其任职长安期间。《乐府杂录》记载唐代音乐之乐调、乐制、乐坛逸闻和名流掌故，为唐代乐坛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温庭筠亦为晚唐音乐名家和词作家，《乾巽子》即为温庭筠于咸通三年夏末秋初由荆南萧邺幕回长安闲居以后撰写。其于序言中所申之“能悦诸心，聊甘众口”，创作主旨与段成式《酉阳杂俎》自序以滋味言其书，颇具同气相投之意。段安节之弟段公路于万年尉任上撰《北户录》，其于序中虽言与“鬼神变怪，荒唐诞委之事”划清界限，但其博物之旨亦与小说家相类。段氏家族于中晚唐期间以小说知名，与张氏家族一样，这个家族文学群体也体现出血缘与姻亲相互交融的特点，但在创作旨趣上，以广博见长，以趣味娱人，体现出晚唐小说在宏大叙事和求怪追新之外的新的发展方向。濡染于长安文化，张氏、段氏小说家族的出现，以一种群体优势对唐代传奇创作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除以血缘、姻缘为纽带之外，还有以业缘因素凝聚成的长安小说创作群体。由于政治文化优势的吸引，四方士人群聚长安，其间虽有政治利益的考量，亦不乏文学旨趣的吸引。中唐以白居易、白行简兄弟为中心，以元稹、李绅、陈鸿、李公佐为外围所形成的创作圈即为显例。他们之间既有诗歌往来，更有传奇创作的相互促进。前述白行简《李娃传》题材源于李公佐的口述，元稹《莺莺传》则有李绅《莺莺歌》相和。陈鸿《长恨歌传》亦是其与白居易传歌相和的产物：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蓝屋。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语及此事，相与感叹。……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10](2782)}

朋辈闲游间，有感李杨故事当以“出世之才”传之后世，遂众推白居易赋《长恨歌》志之，而陈鸿又以《长恨歌传》相配。宴会之闲谈佐欢，为小说题材的搜集提供便利；友朋赏游，唱和砥砺，又激发小说创作的无限灵感。

以学业结缘的士人群体也是推动小说创作的重要因素。唐代大多小说家都多年征战科场，工诗善文，他们好奇尚趣的品格、浪漫风流的情调和对卓异不凡之艺术境界的孜孜追求，为他们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京兆唐临《冥报记》中，多数篇章都点明传述者的姓名身份，其中声名较著者有卢承业、崔敦礼、岑文本、马周、韦琨等，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由士大夫、亲属、僧人构成的文化群体，这个群体既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又是他的忠实读者。另一方面，进士群体加入新贵阶层后，必然要在

精神文化领域有所展现，唐代浪漫的时代气息和充满激情与进取意识的士人风貌艺术地展现在初盛唐诗歌中。至中唐，国势衰退，士人事功之心渐衰，多于现实之外寻求寄托。具体到传奇创作上，体现为以六朝志怪小说“粗陈梗概”的结构方式为基础，辅以想象、虚构，在才子佳人、思妇望归、学子奇遇等情节言说中解释现实人生、消解内心怨愤，表面似痴人说梦，却直逼现实。

三、长安文化空间与传奇小说创作

伴随商业繁荣，长安坊里空间被重新布局，城市区域功能的细化不仅对城市文化和世俗文艺多元化具有助推之力，而且还对传奇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多层面的影响。

首先，欢歌宴饮、士人聚会传奇素材的搜集、创作具有推动作用。长安俗讲、说话之风甚为流行，中唐时长安甚至出现了专攻俗讲的文淑和尚，聚众谈说，听者填咽，冠绝一时。^{[11](154)}妓院亦有以此娱人者，“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12](1403)}一些上层文人甚至亲自上阵表演，“韦绶罢侍读，绶好谑戏，兼通人间小说”^{[13](47)}。长安内外所流行的俗讲、说话之风，对于唐代小说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古小说的创作不同于文人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主要经历两个阶段。前一个过程是口头形式的故事，后一个过程是文字形式的小说。”^{[14](15)}唐代长安市井间流行的“戏谈”“说话”，有利于口头故事的流播，并使其最终在文人手中走向书面化。韦绚亦言其于夔州任刘禹锡幕僚时，“士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语，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15](792)}，由谈而记，反映出《刘宾客嘉话录》产生的过程。唐代长安不仅士子狂欢于京，百官亦多征管逐弦。“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沉醉昼夜”^{[16](7784)}，席间除却歌舞，亦有闲谈佐欢，“昼宴夜话”。剧谈之内容亦颇宽泛，“文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这无疑为唐代传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极好的搜集素材的机会。沈亚之《异梦录》云：

元和十年，亚之以记室从陇西公军泾州，而长安中贤士，皆来客之。……陇西公曰：“余少从邢凤游，得记其异，请语之。”……是日，监军使与宾府郡佐，及宴客陇西独孤铉、范阳卢简辞、常山张又新、武功苏涤，皆叹息曰：“可记。”故亚之退而著录。^{[17](97)}

陇西公于酒宴之中将邢凤怪异之事作为佐兴的话题讲述，沈亚之退而记录，可见文士雅集对传奇创作

素材的搜集颇有助益。“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10](106)}可见《李娃传》是在宴会闲谈中完成了题材搜集，并由白行简整理而成。《东城老父传》中言：“元和中，颍川陈鸿祖，携友人出春明门，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下马覲昌于塔下，听其言，忘日之暮，宿鸿祖于斋舍，话身之出处，皆有条贯。”^{[17](79)}陈鸿祖与友访贾昌，“听其言”而完成了故事骨架的搭建。可见宴集与闲谈都是传奇小说题材搜集的重要场合。以单篇传奇而言，诸如《任氏传》《离魂记》《庐江冯媪传》《非烟传》《长恨歌传》《冯燕传》等，都经历了由“昼讌夜话，各征其异”到“握管濡翰，疏而存之”的过程。这反映出长安市民文学样式对唐代小说发展的推动作用。

其次，城市结构的变化也为传奇小说的情节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小说文体兴起和独立的唐代，这些小说类作品一个普遍的写作技巧就是对虚构性的遮掩，……在虚构技巧还远远没有作为合理的文学叙事功能得到受众普遍的认同与接受之前，构建作品真实的外壳以致‘信史’的效应，当然成为创作者趋之若鹜的经营对象。这种真实的外壳——实际上也是一种虚构——主要表现在人物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与空间设置上。”^{[18](86)}清人徐松云：“余嗜读《旧唐书》及唐人小说，每于言官苑曲折，里巷歧误，取《长安志》证之。”^{[19](1)}对小说地理背景史料的运用，正是基于唐人对长安坊结构真实性记叙这一特征而进行的。现存唐代小说多以长安为背景，以真实街坊名称搭建叙事空间，坊名更替与情节变化相对应，舞台设定与人物行为语言、房屋家具、服装饰品紧密吻合，从而使故事体现出强烈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华州参军》中出现的永崇里、荐福寺、金城、崇义里、群贤里等真实地名，使读者倍感亲切，且使故事充满可信性，并丰富其场景的空间想象。但仅指出这些地名的真实性，还不足以说明小说虚构技巧的逼真，关键是这些地名还与长安坊里空间的文化意蕴相互依存。妹尾达彦对《李娃传》中长安坊里的地名进行分析后认为：“故事情节之所以展开，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利用了当时长安的街衢所代表的含义。”^{[20](520)}因此，长安坊里的空间结构对于唐代小说的情节设置、形象塑造、场景布局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最后，曲江作为重要的文学地理空间，为物命运和情节变化提供了现实可能。^{[18](86)}曲江是长安城内的著名景区，也是信息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场所。刘驾《上巳日》云：“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描写出曲江三月人群络绎，乃至城

内遍觅不得之人皆可于此地相遇。基于此，曲江常成为传奇小说关目设置、情节展衍的重要背景。《华州参军》写柳参军与崔小姐相遇，云：“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搵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蓉。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曲江乃长安坊里的公共景区，在踏青人流中，柳参军与崔小姐邂逅，是极自然的事。这是温庭筠精心设置的关目。裴铏《昆仑奴》记载大历年间奇侠昆仑奴磨勒帮助主人崔生从勋臣家盗出红绡妓并促成他们的姻缘的故事。在后半部分写失踪的红绡妓如何被勋臣家人发现时，写道：“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10](269)}长安坊里，曲江确实是一个“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市隐之地，但曲江作为公共空间，正如刘驾诗云：“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所以红绡妓在曲江出现也必定被人发现。因此无论是故事的开端，还是中间的高潮，裴铏都将曲江作为遇合地。曲江的出现无疑加深了读者对这一长安坊里故事“艺术真实”的判断，也会勾起读者对现实场景的联想，并对小说的真实性产生认同。《李娃传》中郑生被其父从天门街挽歌现场带出，“至曲江西、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10](103)}。这里特别点出郑父鞭打其子的场所是在曲江，一则是因为曲江为游乐地，住户稀少，以免家丑外扬；二则曲江乃唐代进士欢歌宴饮的场所，可借其承载的文化意蕴，来发泄郑父对其子沦落无望的愤恨，从而引发故事转折，韵味隽永。

四、长安文化意象与传奇小说创作

长安为三辅核心，并为都城所在，其文化形象在小说中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即：以安史之乱为界，呈现出初盛唐的富庶繁华和中晚唐的没落衰颓两种迥然有异的面貌。

在唐代小说中，初盛唐的长安呈现出大唐气象，这在物质生活豪奢、社会吏治清明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玄宗造华清宫之广汤池，“环回瓷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揖稽，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丁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可谓极尽豪奢之能事。杨贵妃姊妹之豪奢则更令人咋舌，“贵妃姊妹竞车服，为一犍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这种富贵逼人的豪奢之气与盛唐长安的富庶、繁荣不无关联。陈鸿祖在《东城老父传》中借贾昌之口追述

玄宗在骊山的欢娱场景，“每至是日，万乐俱举，六宫毕从”“角抵万夫，跳剑寻撞，嫩球踏绳，舞于竿颠者，索沮色，遗巡不敢入，岂教揉扰龙之徒”，长安东郊骊山的繁华热闹可与城中相呼应。

盛世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豪奢，也表现在社会风气淳厚和政治吏治清明等方面。玄宗早年“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欲用张嘉贞为相而忘其名，深夜访中书直宿者韦抗，抗以为其人乃张齐丘。玄宗遂命草诏书，事毕韦抗归中书宿，而玄宗“不解衣以待”，夜漏未半，复召韦抗，谓其人乃张嘉贞。^{[21](15-16)}为了任命宰相玄宗竟一夜未眠，反复记忆，其任人之慎重可见一斑。有明主方有贤臣，《开元升平源》写玄宗猎于渭水，姚崇于行所条奏朝政，皆被采纳。^{[17](113-115)}这种君明臣贤、君臣互信的关系是长安盛世的精神表现。吏治清明，士人方有较多晋身机会。《东城父老传》中贾昌以微贱之躯，得玄宗赏识，令世人直叹“富贵荣华代不如”，其戏剧性的命运转折透露出盛世长安社会政治环境的清明。风清气明在民间也有表现。《绿衣使者传》写长安杨崇义之妻与邻人私通，将杨崇义杀害，后为架上鸚鵡道明真相。《传书燕》写长安郭行先之女绍兰，适巨商任宗，任宗为贾数年不归，绍兰遂附书梁间双燕以寄任宗，任宗于荆州得书，为之泣下。两则故事中鸟之灵异实蕴“天下有道”的深致涵义，张说为其立传，亦具昭示太平的意义。

安史之乱后，长安呈现出一片萧条落寞的景象，中晚唐人只能通过追忆和传说在内心复活理想之城，处处透射出今昔对比的失意和落寞，小说中的长安遂由自由阳光之城沦为暮光之城。如作为“潜龙”之地的兴庆宫和“观风俗而劝人”的勤政楼，在盛唐曾是繁华热闹的歌舞之地，到了中唐却物是人非。

唐玄宗自蜀回，夜阑登勤政楼，凭阑南望，烟云满目，……遂命歌《凉州词》，贵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睹，无不掩泣。^{[21](35)}

玄宗于乱后咏旧歌、访旧人、奏旧曲，在悲凉至极的氛围中体味时空交错给人造成的失落感。“烟云满目”四字将玄宗复登勤政楼的迷茫失意之感渲染得淋漓尽致。安史之乱后长安的萧条落寞还体现在以个人命运变化为主的传奇中。如《东城老父传》写贾昌于安史之乱后回到长安，“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布衣憔悴，不复得入禁门矣。明日，复出长安南门道，见妻儿于昭国里，菜色黯焉。儿荷薪，妻负故絮。昌聚哭，诀于道，遂长逝”^{[10](114)}。与玄宗不同的是，贾昌的失落感更多地表现在物质生活的匮乏和生活来源的丧失。此外，此种失落还表现在个人命运的失向上。安史之乱后，玄宗重归长安，成为被人幽囚的太上皇，

“时移事去，乐尽悲来。每至春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玉管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嘘唏”，正是其失意身世的真实再现。作为小人物的代表，贾昌的命运在安史之乱后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他回到长安城，毅然选择了于长安佛寺修习释家经典，其师过世后，甚至“服礼毕，奉舍利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构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洒扫，事师如生”。他的举动不是简单的看破红尘，而是个人对时代与命运剧变后无可奈何的选择。

安史之乱后唐人小说中长安的“双城”形象，是唐人在追忆中形成的，是基于现实的想象。其虽不能与现实完全对接，但却蕴含着唐人对盛世长安之政治清明、国运亨通的理想“国家”模式的反思和建构，也蕴含着他们对安史之乱后萧条落寞之长安的失望之感。就现实意义而言，无疑具有警示意味。

五、结语

任何文体之嬗衍新进既有内在理路可循，亦受外在情势规约，在二者合力中走向繁荣。其中，外在情势蕴含时、空两种因素。长安所承载的文化事件、文化空间、文化风貌、文化群体对传奇文体本身的衍变深具潜默之功。^{[22](322)}唐代传奇如同唐代其他文体样式一样，与唐代历史文化合拍共振，是唐人歌哭与生命的文化载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讲求场景复原或文化还原，这不仅对于作家作品研究具有价值，而且对于文体研究也颇有意义。文体的“复原”，不仅包括梳理辨析其发展源流的“在场”因素，也应辨析其发展的“场外”文化因素，才能对文体发展提供较为充分的诠释语境。

参考文献：

- [1] 杜佑. 通典[M]. 王文锦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2] 李昉.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3] 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M]. 丁如明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4] 白居易. 白居易集[M]. 顾学颉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5] 陶慕宁. 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06.
- [6] 刘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7] 张同利. 长安与唐代小说[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 [8] 段成式. 酉阳杂俎[M]. 方南生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9] 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0] 汪辟疆. 唐人小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11] 赵璘撰. 因话录[M]. 曹中孚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12] 孙棨. 北里志[C]// 曹中孚校点.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13] 王溥. 唐会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 [14] 李剑国.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 [15] 韦绚. 刘宾客嘉话录[C]// 阳羨生点校.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16]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胡三省音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17] 鲁迅. 唐宋传奇集[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18] 朱玉麒. 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9] 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M]. 张穆校补, 方严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20] 妹尾达彦. 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 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21] 郑处海. 明皇杂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22] 王伟. 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22.

Interpretation of space and group analysis of change in Chang'an legendary novel creation in Tang dynasty

WANG W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Imperial examinations taken in Chang'an of Tang dynast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event, which not only dominated the fashions and trends of the time, but also helped push the emergence of novels about the motif of "prostitutes." The newly-arising gentry group constituted not only the main force in creating and transmitting novels of Tang dynasty but also the backbone of the reading groups. Chang'an culture groups, whether by blood, by marriage, by industry, or by schooling, comprise novel creation group, hence keeping close proximity. The space layout of Chang'an city exerte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setting of plots and background of narratives. Hence, the images of Chang'an culture in novels of Tang dynasty presente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for different historical phrases.

Key Words: Chang'an culture; novels in Tang dynasty; cultural cast; creation change

[编辑: 胡兴华]